

大学中国史 论文选读

第一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大学中国史论文选读

第一册

洪焕椿 主编

王云度 刘希为 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316,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书号: 11354·088 定价: 2.70元

责任编辑 邱 禹 杜基顺

编辑说明

《大学中国史论文选读》是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等五院校历史系根据大学文科教学的需要而选编的参考用书。

选编本论文选读的目的,是为了使大专院校文科学生、主要是历史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中国通史时,提供课外参考读物,了解我国史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论文选编的范围,是1949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在报刊上发表的、密切配合教学的论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个别文章略有删节。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学术信息,本书每一册中,适当选编一些近几年来有关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综述和研究动态。书末附有建国以来的部分论文目录,以供学习时参考。

《大学中国史论文选读》共分四册:中国古代史的先秦至南北朝为第一册;中国古代史的隋唐至清前期为第二册;中国近代史为第三册;中国现代史为第四册。全书由南京大学洪焕椿教授主编。本册的编者是徐州师范学院王云度、刘希为同志。

限于经验与水平,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热诚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1985年10月

目 录

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安志敏 (1)
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	范文澜 (26)
春秋战国时期的官私手工业·····	傅筑夫 (41)
论老子哲学思想体系·····	刘毓璜 (70)
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翦伯赞 (92)
秦汉职官制度的形成与影响·····	臧云浦 (117)
关中和秦汉王朝的都城·····	史念海 (140)
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律研究·····	刘海年 (150)
西汉初期的工商业政策与汉武 帝的经济改革·····	刘 凌 (168)
论轮台诏·····	田余庆 (182)
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大地主的田庄·····	邱汉生 (212)
司马迁和班固·····	白寿彝 (227)
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 中的几个问题·····	熊德基 (243)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	黄 烈 (273)
论诸葛亮·····	周一良 (296)
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几个问题·····	高 敏 (312)
北魏初期社会性质与拓跋宏的 均田、迁都、改革·····	王仲莘 (335)

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罗宗真 (371)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三十年·····	田居俭 (379)
近年来夏史与夏文化研究概述·····	曲英杰 (390)
建国以来王莽改制问题讨论综述·····	程有为 (402)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述·····	童超等 (410)
附录：一 先秦秦汉史部分论文目录·····	(436)
二 魏晋南北朝史部分论文目录·····	(455)

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安志敏

一、引言

建国以来的新中国考古学,同其它学科一样,是飞跃发展的三十年,是茁壮成长的三十年。特别是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属于新兴的学科之一。解放以前的三十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发展缓慢,基础薄弱。建国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考古学也完全呈现了崭新的面貌,从调查发掘到科学研究,队伍之壮大,收获之丰富,成果之显著,在世界考古学史上罕与伦比。作为考古学一部分的新石器时代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解放以前,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不过二三百处,而经过正式发掘的更是寥寥无几。经三十年之积累,不过是在黄河流域发现“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虽然初步了解它们的大体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但始终作为两个不相干的文化系统。东北、内蒙古到新疆的北方草原地带,以细石器和篦纹陶为代表的遗存,被作为一个文化系统而称之为“细石器文化”;至于长城附近与彩陶、磨制石器共存的,则被视为“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东南沿海一带,凡以几何印纹陶和磨制石器为代表的遗存,都被称为“几何印纹陶文化”。以上三者构成中国新

石器文化的主体，至于其它地区的零星发现，尚无法联系起来。总之，当时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基本轮廓还不清楚，在文化性质上仍若明若暗，在年代上则一概作为晚期的遗存，从而缩短了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历程，这就是过去的工作基础。

建国三十年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超过六七千处，大规模的调查发掘遍及全国，新的发现丰富多彩，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同时还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碳-14的年代测定，陶器的化学组成、烧成温度和物理性能的分析，体质人类学的骨骼测量，农作物和家畜种类的鉴定等，都取得一系列成果。由于考古研究的空前发展，积累丰富的物质资料和科学论据，大大开阔我们的眼界。从全国范围来讲，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已基本上填充地区或时代上的空白；这些考古发现，又在文化类型之间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揭露许多新问题，显示它在世界考古学特别是亚洲考古学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可能对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做出全面估价，只是就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理解谈一谈对若干问题的粗浅认识，以供进一步探讨的参考。

本文引用的碳-14断代数据，半衰期均按 5730 年计算，为了便于比较，凡属可能校正者，将树轮校正年代附在括弧内说明；一般采用达曼对照表，个别早期的则采取迈克尔对照表，由于某些数据已超出所有树轮校正表可能校正的最高年限，无法进行确切的校正，故暂缺。凡同一文化中具有多数断代数据者，仅举其早晚为例，必要的另外予以说明。

二、细石器传统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细石器的新发现,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作为一种新兴的工艺传统的产生和发展,代表不同的时代和分属于若干文化系统,决不是“细石器文化”一词所能概括的。

首先,在陕西大荔沙苑发现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接着在河南许昌灵井也有发现。这就证实中原地区不仅有典型的细石器,而且可能是农业产生以前的中石器遗存。细石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晚期,如山西朔县峙峪和河南安阳小南海都出现了细石器的雏形,从地层堆积和共生的动物化石,证明它们属于更新世晚期,特别是碳-14断代提供更确凿的证据,前者 ZK109-0 为公元前 26950 ± 220 年;后者下层 ZK654 为公元前 22150 ± 500 年,上层 ZK665-0 为公元前 9050 ± 500 年。典型的细石器至少在旧石器晚期的末叶已经出现了,如山西沁水下川和河北阳原虎头梁都是代表性遗存,它们一般缺少共生的动物化石,前者测定过六个碳-14 数据,ZK417、358 为公元前 21950—14450 年,后者未经测定,年代应约略相等。结合上述发现,大致可以推定典型的细石器出现于旧石器晚期的末叶,而盛行于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这些早期遗存都位于华北一带,因而它可能是细石器传统的产生中心,并影响到东北亚洲和西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随着农业经济的兴起,中原地区的细石器传统已告衰落,但在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都有残余的细石器。

从东北经内蒙古到新疆的北方草原地带,广泛分布着细石器的遗存,有的不与陶片共生,有的则包含不同种类的陶

片,表示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或文化系统。解放前只限于地面采集,往往弄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目前的发现则提供地层或时代上的证据。例如黑龙江海拉尔松山和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江岸二队等地,都发现单纯的细石器地层,出有较原始的船底形石核,可能属于中石器或新石器的早期遗存。辽宁沈阳新乐下层和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都发现聚落和房址,除细石器之外,还有磨制石器与篦纹陶共存,前者分布于辽宁的东南部,可称为新乐一期文化;而后者则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可称为富河文化。碳-14年代前者 ZK267 为公元前 4195 ± 120 年(校正: 4850 ± 145 年),后者 ZK188 为公元前 2785 ± 110 年(校正: 3350 ± 145 年)。此外,辽西一带的红山文化则有彩陶、篦纹陶与细石器共存;辽东大长山岛则发现与新乐一期文化层被叠压在变体的龙山文化遗存之下,说明它们的文化面貌及其分布是相当复杂的。至于东北一带使用细石器的下限,可以晚到汉代甚至辽金时期。

沿长城直到宁夏、甘肃一带的细石器遗存相当复杂,除伴存篦纹陶或绳纹陶以外,有些可能属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范畴,大都有细石器共存。新疆一带的细石器及其共存陶器,又另具特点,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并为一个文化系统。

西藏北部的那曲、西部的阿里和南部的聂拉木等地,都发现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年代可能稍早。此外,云南元谋和广东南海西樵山也都发现不与陶片共生的细石器。

细石器传统的出现以华北为最早,不仅影响到东北亚洲的广大地区,甚至波及西北美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存在于不同系统的文化中,但它又不同于以欧洲、北非和西亚为中心

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考古问题之一,值得今后深入探索。

三、中原早期遗存的新发现

一直作为缺环的早期新石器遗存,由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发现,开始有所突破。前者已发现二十余处,主要分布在河南的中部,如郑州、新郑、尉氏、中牟、密县、巩县、登封、长葛、鄢陵、郾县、项城和潢川等地;后者仅在河北武安发现两处,估计在冀南、豫北会有更广泛的分布。从文化面貌上看,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能属于两个系统,故分别命名。

裴李岗文化遗址经过发掘的有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和长葛岗河等处。莪沟的房址为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有狭窄的斜坡阶梯式门道,室内周壁遗有柱洞。各遗址的灰坑均作圆形,一般小而浅。裴李岗还发现一座横穴式的残陶窑。墓葬共发现近二百座,集中葬埋形成氏族公共墓地,排列密集而有一定的规律,以单人葬为主,也出现个别的双人合葬。磁山文化的圆形带阶梯门道的浅坑,当属于房址。灰坑有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的三种,其中长方形者有深达五米以上的,系贮藏用的窖穴。墓葬尚未发现,不过有许多成堆的器物,有规律地放置在一起,虽不见人骨,也可能属于墓葬的遗迹。上述遗址都达数万平方米,且有房址、窖穴、窑址和氏族公共墓地,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聚落。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富有农业经济的色彩,典型器物如带足石磨盘、棒状石磨棒、狭长扁薄的双弧刃石铲、带锯齿刃的

石镰(磁山镰少且无锯齿刃)等,都属于农业工具,特别是在磁山的窖穴里还发现过成堆的腐朽粮食,可能属于粟类作物。裴李岗出土有栩栩如生的猪头陶塑,磁山则发现大量猪、狗等骨骼,反映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家畜。这些充分说明当时过着以农业为主要来源的经济生活,象磁山所发现的大量朴树籽、鱼骨和兽骨等,则表示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一定的比例。

在陶器上具有一定的原始性,都是手制,胎壁厚薄不匀,烧成温度一般较高,裴李岗为900—960℃,磁山为700—930℃,裴李岗还发现过与仰韶文化相近的横穴窑,表明在制陶工艺上已有相当发达的基础。尽管常见的器形有所不同,但两种文化的双耳壶、大口深腹罐,毕竟属于同类器物,特别是象圜底钵、三足钵、假圈足碗和鼎等器形都基本一致。甚至中原地区罕见的篦点纹,两者也都有发现。不过象磁山那种以孟和支架为代表的陶器群,全然不见于裴李岗;同时磁山陶器上所习见的绳纹和个别彩陶,在裴李岗则绝无存在。至于磁山陶器的纹饰种类和比例,较裴李岗大为增多,器形种类也更加复杂化,究竟是反映不同的文化内涵,还是具有相对的发展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工作。

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还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表现相当密切的联系,如房址、窑址和墓葬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作为前二者的典型器物,象圜底钵、三足钵、大口深腹罐、假圈足碗、长颈瓶、双耳壶和鼎等,均见于仰韶文化,而绳纹和彩陶等纹饰在仰韶文化中更为普遍。此外,石磨盘和石铲在仰韶文化中仍有残余,不过在形制上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迹象充分表明它们属于仰韶文化的先驱,这就更加延长中原文化在发展上的连续性。至于篦点纹的出现,也是目前最早的遗

存,那么东北和东南沿海的同类遗存,当同中原地区有着一定的文化联系。

碳-14断代为上述两个文化的年代提供一系列的数据,不过某些标本由于木炭量过少,合并不同的出土单位,并用本底苯填充,不排除有较大误差的可能性。如裴李岗的三个数据:ZK434 为公元前 5935 ± 480 年,ZK571 为公元前 5195 ± 300 年(校正:5879 年),ZK 572 为公元前 7350 ± 1000 年,相差悬殊。不过与裴李岗相同的莪沟北岗遗址也测定过三个数据(WB78-31、38、39),为公元前5315—5025年(校正:5916—5737 年),由此可证裴李岗文化的年代当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至于个别较早的数据或可摒弃不用。磁山遗址也测定过三个数据(ZK439、440、BK78029),为公元前 5405—5110 年(校正:6005—5794 年),则它们的年代也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当然现有的数据仍不排除有一定误差的可能性,不过已充分显示裴李岗和磁山可能是同时并存的两种文化。由于两者的地域分布不同,文化面貌互有差异,但年代却大体接近,这就为我们划分为两种文化提供有力的旁证。这无疑是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目前已知的最早遗存,但它们同中石器之间的缺环,仍有待继续探索。

此外,同上述两个文化相类似的遗存,在陕西也有发现,如所谓“老官台文化”,其陶器是大口深腹罐、假圈足碗、圜底钵和三足钵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钵口已施彩,而陶质、器形和纹饰却与宝鸡北首岭下层一致,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范畴;秦岭以南的西乡李家村遗址则另具特点,虽同仰韶早期有所类似,当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年代也可能稍迟。山东滕县最近发现的北辛下层,被叠压在大汶口文化之下,石磨盘的形

制与磁山相似,但多不带足,有铲无镰,陶器则以鼎和支架为代表,虽接近于磁山文化,但差异还是相当大的,象红顶碗和口缘带彩的钵,毕竟同仰韶早期更为接近,其年代应约略相当。它可能属于大后口文化的前身,而有必要另行命名。

四、仰韶文化的类型和变体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分布较广,而延续时间较长的一种新石器遗存。它的地理分布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豫、晋、陕、冀、陇东、宁夏、内蒙古南部和鄂西北一带。碳-14年代已测定三十七个数据,其中ZK519、115为公元前4515—2460年(公元前5150—2960年),表明仰韶文化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农业经济相当发达,除粟类作物外,还出现蔬菜的种植。定居生活相当稳固,形成大规模的聚落遗址,从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不等,象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遗址的发掘,对当时的村落布局和经济生活等,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画。

仰韶文化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其突出特征,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器形种类和纹饰变化等方面表现较大的差异,因而提出划分类型的概念。尽管在类型的划分标准和如何命名方面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对于它们之间的不同文化相以及发展趋势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以黄土高原为代表的遗存,暂可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四个类型;在黄土高原的东南边缘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即洛阳以东的豫中地区,可划分为秦王寨或大河村类型;在沿太行山麓的华北平原,即豫北、冀南一带,可划分为后岗、大司空村类型。当然以上的划分并不代表其发展的全过程,有些缺环

仍有待于填补,不过结合地层关系、文化面貌和碳-14断代,基本上可以肯定各类型之间的相对序列及其年代之间的对比。

黄河上游的遗存,与仰韶文化有一定的差异,过去称为甘肃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以资区别。大体上可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代表它们的发展序列。由地层关系上证实,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早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而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石岭下类型,从陶器的器形和彩陶纹饰上,表现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碳-14数据也提供有力的证明:如石岭下类型 ZK186 为公元前 3190 ± 160 年(校正: 3815 ± 175 年);马家窑类型三个数据中, ZK108、BK 77013 为公元前 2575—2500 年(校正: 3100—3010 年);半山类型四个数据中, ZK407、406 为公元前 2230—1970 年(校正: 2680—2355 年);马厂类型七个数据中, ZK348、346 为公元前 2020—1715 年(校正: 2410—2050 年),表明它们均迟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事实上石岭下类型具有过渡的性质,从陶器器形和彩陶特征来看,似归入马家窑文化为宜。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和苏北的部分地区,并发展到皖北、豫东和辽东半岛一带。在发展上,也大体经历两千来年的时间,在十二个碳-14数据中, ZK90、479 为公元前 3835—2240 年(校正: 4494—2690 年),不过其中的四个数据 (ZK317、391—0、321、361—0) 年代偏晚,为公元前 1960—1610 年(校正: 2350—1905 年),不象是测定上的误差,可能由于在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分界上有所混淆,它的下限至少以早于公元前二千年为是。大汶口文化具有本身的特点,并且可能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先驱,但它的早期却不可否认受到仰韶文化的浓厚影响,如盆、钵、豆、鼎等陶器,特别是

三角涡纹和圆点纹等彩陶纹饰,都和仰韶文化相接近;同时河南郑州大河村和鄱陵故城等仰韶文化遗址中也都发现类似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物的背壶,可能说明在两者的接触地带而互有影响。至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深入到豫中地区,如平顶山市寺岗、偃师滑城都有所发现。辽东半岛旅顺郭家村下层,则以带划纹的大口深腹罐为主,从器形上与沈阳新乐一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相近似,也有彩陶以及鼎、鬲、盂等器形与大汶口文化相一致,可能属于一种地方性的变体。此外,大汶口文化的人骨具有与仰韶文化相似的特征,至少两者的关系比较密切。至于大汶口文化人类头骨的人工变形与敲牙,代表一种特殊的习俗,并不能把它作为接近玻里尼西亚人种组群的证据。

辽西一带的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具有更接近的性质,如泥质红陶的碗、钵、豆,特别是红顶碗和彩陶尤为一致,敖汉旗四棱山发现的横穴陶窑,也与仰韶文化具有更大的共性。不过象加饰弧线形篦纹的粗陶罐,则不见于仰韶文化,甚至这种篦纹还施于泥质红陶之上,并有大量细石器共存。过去把它作为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的提法,不见得妥当。最近在河北廊坊也发现了同类的遗址,可能是它的分布南限,这就表明红山文化可能是与仰韶文化接壤的一个地方性的变体。

由东北到内蒙沿长城一带,有许多遗址具有仰韶文化的特点,往往与细石器或其它类型的陶器共存,由于都是地面采集,无从判断它们的共存关系,不过从遗物的性质上观察,大部分属于典型的仰韶文化,有些则可能是与红山文化相类似的地方性变体。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主要遗存,它继承早期的裴李岗

文化和磁山文化,下接龙山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显示中原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有关的遗存中,以仰韶文化的出现为最早,而周围的遗存则属于它的支脉或地方性变体,或者是接受它的影响,这反映出仰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化史的发展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五、龙山文化的再认识

继仰韶文化而兴起的龙山文化,地理分布益加广阔,文化面貌的地域性,也表现得更加突出。首先在陶器上已变成以灰陶为主,器形和纹饰均较仰韶文化有巨大的变化,它的晚期还出现轮制,表明制陶工艺的进一步发展。过去把龙山文化作为单一来源或由东向西发展的提法,已经无法成立了。为了处理方便,曾分别冠以省名或另外给予文化名称以资区别,如山东龙山文化(或典型的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或后岗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还发现早期龙山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通过大批资料的发现,取得了下列的认识:

庙底沟二期文化叠压在仰韶文化之上,目前的分布仅限于豫、晋、陕交界地区。陶器以灰陶为主,但不见黑陶,很多器形承袭自仰韶文化,尤以大口深腹带纹罐、鼎、小口尖底瓶、菱形带纹彩陶罐和红衣小陶杯最为突出,代表由仰韶向龙山的过渡阶段,属于早期龙山文化。据碳-14断代,ZK111为公元前 2310 ± 95 年(校正: 2780 ± 145 年),也进一步得到确定。

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河南之外,尚包括晋南和冀南的部分地区。陶器中的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等纹饰继承自庙底沟二期文化,轮制和黑陶占相当的比例,器形的特点是,鬲多而鬲

少,有甗无甗 鼎也不多见,以敛口深腹小平底罐为主,也有单耳或双耳的浅腹杯等。在十五个碳-14数据中,ZK200、441为公元前2100—1810年(校正:2515—2155年)。不过有两个数据疑有误差,如ZK359为公元前 2450 ± 160 年(校正:2950 $\pm$ 195年),显得偏早;ZK349 为公元前 1690 ± 100 年(校正:2005 $\pm$ 120年),又显得偏晚。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两者联结得如此紧密,以致在划分界限上可能发生混淆的现象。陶器以轮制为主,多典型的黑陶,陶面的修饰主要是素面和磨光。在器形上鬲多鬲少(或不见鬲),有甗无甗,鼎类颇多,罐类以矮肥的形式为主,同河南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差异。它的分布以山东为主,河南、河北、江苏的部分地区以及辽东半岛一带也有所分布。在三个碳-14数据中,其 ZK390-0、364-0 为公元前2010—1530 年(校正:2405—1810 年),表明它的年代一般较迟,当中原地区已进入早商之后,山东龙山文可能还延续了一个时期。黑陶上的云雷纹和玉钺上的兽面纹,或许表示它与中原的青铜文明有所接触。从文化相上来看,由东而西逐渐变化,终于过渡到河南龙山文化,以致找不出绝对分明的界限。至于辽东半岛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旅顺老铁山积石墓、郭家村上层、长海上马石中层出有蛋壳陶、黑陶杯和环足鼎等酷似山东龙山文化,其它器物则差异较大,可能属于地方性的变体;另外如双砣子一期文化,虽以黑陶为主,但不见轮制,在烧好的黑陶上绘以红、黄、白色的纹饰,则为山东龙山文化所不见。据碳-14 断代,ZK78 为公元前 2060 ± 95 年(校正:2465 $\pm$ 145年)。双砣子二期文化则具有相似的性质,以轮制黑陶为